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重新思考： 从功能性路径到制度性路径^{*}

[日]石田護

10+3在区域金融安全网络上已取得诸多成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扩大了金融合作。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当前，这种恶化已开始阻碍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民间交流以及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中日双方的政治领导人不应只着眼于争论钓鱼岛主权，而应该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来交流确保东亚和平稳定的大构想，并且说服各自的国民。还需要很多学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描绘可供选择的理想蓝图。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 中日关系危机 东亚金融合作 钓鱼岛问题

欧洲通过整合区域经济和建立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了和平反战理念的制度化，并成立了欧洲联盟。在东亚，企业的商业活动实际上已经使得经济一体化率先形成。2005年，东盟10+3（东盟10国+中日韩）的首脑们决定将其发展成为东亚共同体。但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短期内实现制度化非常困难，因此东亚选择了“先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再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功能性路径（functional approach）^[1]的推进方法。

石田護系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

^{*} 本文由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林盼菁与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虎翻译。

[1] 即通过金融、环保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最终实现共同体目标的做法。与此相对照，制度途径是指从制定一种制度开始的方法。2004年5月11日，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政府关于东亚共同体的看法”一文中指出，虽然功能性途径起着非常明显的重要作用，但仅凭功能性途径是不能构建起一个共同体的，有必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考虑建立一种制度。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合作走向东亚共同体”将考察功能性路径的具体事例之一东亚金融合作的成果，并对其进行展望。东盟10+3在区域金融安全网络上已取得诸多成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日两国更是扩大了金融合作。东盟10+3的金融合作在不断前进，已经到了“只要汇率稳定机制建立，东亚共同体就指日可待”的阶段。

然而，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各类民间交流以及金融等多领域的合作成果都无法阻止此次关系的恶化。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开始阻碍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民间交流以及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为何会形成这个局面，该如何解决问题？此即第二部分“中日关系修复与东亚安全保障改善”所要分析的问题。

在第三部分“东亚的挑战”中，将着重说明东亚若想要克服中日关系危机，并建立区域和平保障机制，就应在危机之下的现在，通过制度性路径(institutional approach)来克服功能性路径的局限性。即，重新推进10+3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和欧洲共同体一样，完善货币合作和安全保障环境对于东亚共同体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

从金融合作走向东亚共同体

(一) 东亚金融合作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指出，东亚金融合作具有“危机推动型”的特性，当重大危机迫使中日不得不将政治和历史问题搁置起来时，金融合作就会被推动。首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召开的。之后，10+3建立了提供紧急信用贷款的“清迈倡议”(CMI)，10年来不断扩大其资金规模，改善运营方法。同时，将财长会议和财长代理会议以及小组会议例会化，并设立了AMRO(东盟10+3宏观经济研究所)，完善了体制。未来，CMI将可能成为以AMRO为事务局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金融合作成果是中日货币当局在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时仍坚持务实合作的成果。

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东盟10+3再次显示了“危机推动型”的特性。2012年3月，日本财务省中尾武彦财务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在雷曼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市场上出现了美元资本短缺的现象。

我们有必要提高日元、人民币、韩元等亚洲货币的有效利用。”AMRO首任局长魏本华也表示：“为防止欧洲的状况波及东南亚，我们将密切关注危机。”2011年12月25日，温家宝总理和野田佳彦首相就日元和人民币的有效利用以及加强亚洲金融安全网达成协议。中日为确保东亚经济稳定，将金融合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二）通往东亚共同体之路

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出口、消费、投资的协调发展。虽然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但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加，亚洲现在正处于内需扩大时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国除了“谋求与其他亚洲各国共同发展”之外别无他路。日本也在参与亚洲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求本国发展之路。

东亚若要结成一体并实现发展，就需要稳定的金融环境。10+3已经建立了提供信用贷款的框架，余下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定汇率机制。2005年，10+3领导人会议就加快研究“更紧密的、有协调性的区域汇率机制”达成了协议，但至今未有具体行动。2006年，东盟10+3峰会就“为进一步稳定金融制定区域货币单位构建的顺序”的研究再次达成协议，中日韩财政主要官员宣布了“立刻开始讨论有关汇率政策协调制度的日程表”。但之后该协议却并无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担心协调汇率政策会失去本国经济政策的自由度。但是，我们在过去已经见证了因汇率不稳定而造成一国产业空洞化的事实。东盟各国饱受美国货币政策之灾——一旦美国放松银根，造成美元流动性过剩，本国汇率就上升；相反一旦美国收紧银根，美元流动性就不足，本国汇率就下跌。由于各国的汇率波动程度不同，因此便在区域内出现了竞争力的差距，影响了区域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实现东亚经济的稳定发展，区域内汇率稳定机制不可或缺。

我们从欧元危机中认识到了在亚洲实行统一货币未必是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货币合作。中日两国应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单独应对频繁涨跌的美元并为日元过度波动和升值而痛苦不堪，而之前的德国马克却在欧洲货币体系（货币统一前的阶段）这一机制中得以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

实际上，在东亚已诞生了多个经济合作机制。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东盟邀请中日韩参加，由此有了10+3峰会；日本一直以来担心中国影响力过大，在其主导下，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加入了10+3，从而成为10+6，之后发展成现在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国自2009年以来不断扩大外交和

军事实力，东盟对此感到威胁，于是在2011年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入，由此诞生了10+8。而美国则出于经济上和地缘政治学上的动机，正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同的诞生历程决定了各个机制性质的不同。如果说实现汇率稳定的货币合作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共同体就是有着10年金融合作成果和合作体制的10+3，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机制。作为功能性路径的金融合作在不断前进，如果10+3能够达成汇率稳定机制协议，通往东亚共同体之路就近在眼前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完善安全保障环境。

中日关系修复与东亚安全保障改善

（一）钓鱼岛危机：开端与现状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认为此举无视“搁置主权争议”的默契，对此提出抗议。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开端。根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担任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和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退休后的回忆录，关于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之间是有默契的。^[1] 1978年10月，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事宜访问日本时也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曾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担任条约课长并参与编制共同声明的栗山尚一也说过：“我认为当时领导人之间是达成搁置争议默契的，我现在也还是这么认为。”在1978年邓小平副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说：“我认为这实际上是1972年达成的默契，在1978年再一次得到确认。”^[2]但是，日本外务省的会谈记录中没有关于默契的丝毫痕迹，这也是日本政府否定存在默契的证据。

1979年，日本计划在钓鱼岛建设直升机场，中国认为这是破坏默契的行为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日本放弃了直升机场的建设，中日两国回到了默认搁置的状态。2010年发生了渔船冲撞事件，民主党政权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处理；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这两次事件都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由于民主党的两任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一直坚持“钓鱼岛根本就不存在领土问

[1] 「橋本恕氏に聞く一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記録と考証』，岩波書店，2003年；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143113.htm>。

[2] 栗山尚一：“维持现状需要双方努力”，『朝日新闻』，2012年10月31日。

题”，以及前外务大臣原诚司表示“是邓小平单方面的认为，日本方面并没同意”，最终导致民主党政权在此问题上没有任何施展计策的空间。

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认为这是否定了双方的默契，中国也没有必要继续自律，因此在钓鱼岛周边加强了船只和飞机的示威活动。同时由于日本多次宣称在领土问题上没有协商的余地，中国的示威行动不断升级。虽然这是一种逼日本坐到谈判桌前的战术，但是也提升了意外冲突发生的风险。2013年11月，中国划设了防空识别圈，并表示“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中日之间毁灭性的纠纷，不能说必然会发生，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其可能性在增大。”^[1]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日关系正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二）冻结现状+危机管控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13年12月3日与安倍首相的共同记者招待会上说：“意料外的冲突比意料中的冲突会更加严重。误测和误打的可能性太高了。中日两国需要一个危机管控机制和有效的交流渠道。”^[2]对于拜登副总统的这种见解，我充分地赞同。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也提议：因为在主权问题上只要向前一步，就会使得战争走近，因此我们应该冻结现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通过文化交流以及青少年交流等方式逐渐淡化钓鱼岛问题。^[3]但是，从钓鱼岛危机发生的经过来看，如果日本一直不承认搁置争议的共识，那么中国响应冻结现状的可能性也不大。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以及各类民间交流都无法阻止此次危机的发生，可见以坐等问题淡化的方式是很难平息事态的。

（三）交由国际法庭评判

2012年9月26日，野田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为使纠纷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应该关注国际司法机构的作用。实际上，日本曾提议将竹岛（韩国称为“独岛”）主权问题交由国际法庭评判，但是遭到韩国的拒绝。笔者认为，与其

[1] 日本经济新闻翻译转载英国《金融时报》文章：Martin Wolf, 「[FT]挑発行為強める中国 経済損失招く可能性」, 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 2013年12月4日。参考网址：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GM0401M_U3A201C1FF1000/。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to the Pres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 December 03, 2013. 参考网址：<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2/03/remarks-press-vice-president-joe-biden-and-prime-minister-shinzo-abe-jap>。

[3] 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 「米中2強時代、バランス試される安倍外交 J.ベーター氏と宮本雄二氏に聞く」, 2013年12月30日。参考网址：<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ZO49244340W2A201C1000000/?df=2>。

面对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状况，不如将钓鱼岛问题交由国际法庭评判。但遗憾的是中日双方似乎都无此意。

（四）回归搁置争议状态

2012年9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日本回到双方的共识和默契上来，回到谈判解决纠纷的轨道上来。事实上，如果排除军事手段解决的途径，那么作为现实选择就是回归搁置争议的状态。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在2013年1月25日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之前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交给有智慧的下一代是明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也对山口那津男表示“也可以交给下一代人处理”。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请山口那津男为中日首脑会谈的召开创造环境，并强调：“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虽然召开中日首脑会谈的呼声高涨，但安倍晋三首相一连串的言行遭到中国的抗议，导致两国间失去了会谈的机会。安倍首相在2013年2月21日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称：“中国有‘根深蒂固’的需要与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发生领土冲突，因为执政的共产党用争议来保持强大的国内支持。”对此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表示：“一国领导人如此公然歪曲和攻击邻国，煽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这是罕见的。”从中国看来，安倍首相展开的是中国包围网外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的问题，但如果他过分地放大了这点，那么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日本与“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的韩国也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存在对立。出席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曾写道：“邦交正常化后，两个体制相异的国家和平共处了20年，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而美国虽然警惕中国，但也在不断地摸索与中国这个体制和价值观相异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

此后，中国也多次呼吁搁置争议，但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13年6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现在也在日本的实际管辖之下。和中国之间不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也不存在是否应该搁置的问题。”这就是日本的全部立场。虽然安倍首相也称“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并呼吁召开中日首脑会谈，但是如果他坚持“领土问题没有协商余地”的话，中国是不会响应他的呼吁的。

（五）搁置领土问题+资源共同开发

中国曾呼吁过搁置主权争议并进行资源的共同开发。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提议搁置主权问题和进行石油的共同开发。之后1979年中国向日本正式提出该建议。日本运输大臣森山钦司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也提议共同开发，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表示同意。但当时台湾抗议说“叛乱团体的共产党无权与日本协议钓鱼岛问题”，而日本无法说服台湾。^[1]然而现在马英九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呼吁共同开发资源。2008年5月，福田康夫首相和胡锦涛主席发表中日共同声明，表示“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并达成了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协议（后来中国因国内反对单独进行开发）。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赞成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21世纪不是搞军备扩张的时代，要尊重各国的主权，但是也要避免因主权纠纷引起战争的发生。”^[2]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日两国为解决危机，在回到搁置争议的同时，或是在回到搁置争议稍后不久，实现资源共同开发协议，这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的外交政要也表示，没有比回归搁置争议更好的解决办法，期待看到恢复东海油气田的共同开发。^[3]如果能够将搁置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这一做法运用于南沙群岛领海纠纷问题，那么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由于安倍首相声称在领土问题上没有商谈的余地，因此可以考虑中国与东盟先行达成搁置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协议，再将其做法运用于钓鱼岛和竹岛（包含10+3整个地区）主权纠纷。1988年，邓小平副主席向菲律宾的阿基诺总统提议搁置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4]2013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戚建国副总参谋长在新加坡的亚洲安全保障会议上也表示，“中国一直提倡搁置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明智的战略选择”。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可行的”。实际上，2013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与越南的阮晋勇总理已经就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达成协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与菲律宾的国有石油公司达成南海资源共同开发

[1] 朝日新聞：「絡む複雑な利害・思惑一前提の境界線まづ難題」，1979年7月24日，朝刊，12版。

[2]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センター2009年夏季刊：『特集 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VS凌 星光・当社団理事長』，社団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センター，2009年7月。

[3] Nye, Joseph S. Jr., “Our Pacific Predicament”, *American Interest*, March/April 2013.

[4] 中国外交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07日。（英文版的“Set aside dispute and pursue joint development”，在2000年11月17日刊登在中国外交部英文版网页上，目前已被删除。）中文版文章参考网址：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t8958.shtml。

合作协议，设置了联合工作组。中国在积累了与东盟各国共同开发的经验之后再呼吁日本共同开发钓鱼岛也是一个可行的做法。

但是对于这个构想我们所担忧的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展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并加强了军备，东盟各国对此十分警戒。东盟邀请美俄参加东亚峰会，10+6成了10+8，这有助于美国扩大对东亚的干预。日本安倍首相在2013年10月9日的日本—东盟峰会上表示：“为了能够让南海问题依据国际法得到解决，强烈希望与东盟保持一体，作为日本与东盟的共同课题继续合作下去。”关于东盟和日本的接近程度，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西蒙·戴称：“东盟不可被拉进日本的抗华联合中来。”^[1]东盟既不希望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也不希望中日对立。中国已经认识到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警惕，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讲到的“中国将用行动来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担忧，与东盟各国成为同舟共济的好邻居”的谈话中看出来。

欧洲从煤炭、钢铁资源的联合管理着手，将和平反战的理念制度化。东亚也可以通过日本、中国以及与中国有领海纠纷的东盟国家联合开发资源的方式，分享经济利益，构建和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中日两国争夺钓鱼岛非但不能获得各自国家利益，反而恶化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安全保障环境。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观点出发，外交上采取攻防策略是国际政治上常有的事情，但是仅靠攻防策略有时会事与愿违。一起描绘未来，并为此提高合作水平也是外交的工作之一。我认为，中日两国应该选择放弃争夺狭隘的国家利益，共同建立一个能够在整体利益中实现稳定国家利益的机制。

对于一直坚持钓鱼岛是本国固有领土的中日两国政府来说，要让本国民众接受搁置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并非一件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据日本言论NPO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日报社共同组织的民意调查，被调查者中9成以上的人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有23.7%的日方被调查者和52.7%的中方被调查者认为两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同时，有52.6%的日方被调查者和54%的中方被调查者认为东亚需要一个安全保障框架。两国民意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有必要在东亚建立一个安全保障机制”。

上述显示的民意是支撑中日关系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20世纪的30、40年代，日本国内激进勇武主义盛行，形成了好战的社会氛围，就连军

[1] Simon Tay, “ASEAN Must not Be Dragged into an Anti-China Coalition by Jap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2, 2013.

队也难以逆道而行。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我担心，如果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一直僵持，那么上述的社会风潮有可能再次形成，一旦发生冲突事件，那么事态将会陷入失控的局面。中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应认识到隐含在中日关系危机中的重大风险，负起责任建立和平机制，从而转化危机。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不失面子地收手。但是难题就是各自国内复杂的政治状况和如何解决两国外交上的摩擦问题。

1995年11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广岛，我向他询问欧洲货币联盟是否能在60%的民意反对之下实现？施密特说道：“说服国民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科尔总理会做到的。”我认为，中日双方的政治领导人不应只着眼于争论钓鱼岛主权，而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来交流确保东亚和平稳定的大构想，并且说服各自的国民。

东亚的挑战

如果日本、中国、与中国有领海纠纷的东盟各国能够在搁置主权争议和资源共同开发问题上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东亚就接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的那个阶段了。但是目前在东亚，中日间围绕历史问题的倾轧、缺乏信赖以及美日同盟的存在等因素在阻碍着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下面首先从这些阻碍因素开始讨论。

普通的日本人对“钓鱼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历史问题”这一概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基本上来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末期将钓鱼岛编入日本国领土这一事情是违反正义的，但日本方面则主张其编入手续的合法性。许多日本人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解释，但与此同时也知道中日间围绕着钓鱼岛主权存在着争议且就是否继续搁置争议存在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化感到威胁，而这又导致了日本民众理解并支持安倍政权提出的美日同盟强化和国防力量增强等主张。但是，对于安倍政权强硬姿态的未来抱有怀疑的国民绝不在少数。我注意到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项民意调查，对于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这一问题，有41%认为是必要的，有24%认为没有必要，但对于是否对宪法第九条——规定和平主义和放弃战争力量——进行修改这一问题，28%认为有必要，41%认为没有必要。此外，就像安倍首相明确表示的那样，因为日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独立保卫日本，因此日本防卫力量的强化会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进

行。自1971年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以来，中国一直肯定美日同盟作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瓶盖”作用。目前，美日同盟的对日控制作用依然没有失效。^[1]

对于日本经常被拿来与德国比较和批评的问题，我认为其原因在于日德间国际环境的不同和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迟钝。在德法之间推进和解进程的冷战时期，中日则分处于苏美阵营。我认为，就像中国的一些日本研究人士指出的，日本之所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是因为冷战初期美国为了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而在占领政策中允许天皇体制的存续和旧官僚体制的复活。^[2]虽然安倍首相表示“历史问题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但国际社会要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历史意识，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历代的德国领导人一直都谈到了政治对历史的责任。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过：“没有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则无法开拓未来的道路。不可以将历史简单地用一些偶然事件和行为的因果关系解释。它是包含着义务和责任的。”战争结束68年后的2013年9月4日，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了法国中部的奥拉杜尔村——二战时期在该村庄发生了屠杀惨剧。当时，法国总统奥朗德评价高克说：“你选择来到这里，敢于直面昨天的残暴，你代表了德国的尊严。”德国被欧洲各国广为接受，与法国一同引领着欧洲一体化，现在又支撑着危机中的欧元区，上述这些事情都令德国人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一点才是日本应从德国学习的核心部分。

安倍首相以摆脱战后体制作为其政治信条。因此，他提出修改当年美国深入参与制定的宪法，并主张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站在胜利者立场上的断罪。他的政治信条有点类似于以反美为主要基调的、对侵略罪行毫无反省之意的游就馆（靖国神社的宝物馆）所提倡的理念。公明党的山口那津男代表曾提议，建立一个无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但安倍首相以“遗族的情绪为重”为理由表示否定。我认为，日本的首相关心本国战死者遗族的情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按理说更应该（或者至少同等地）重视战争被害国遗族的情绪。德国总统高克在访问奥拉杜尔村时表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能体会你们”，就是因为这一理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向日本说过“子子孙孙友好”，我认为实现它的第一步就是日本人体体会被害国国民的心情。为此，日本人应该学习历史的真相。对于这个问题，安倍政权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在领土和

[1] 王少普：“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关系”，《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第43~48页。

[2] 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第36~46页。

历史认识问题上反映政府立场的教科书鉴定新标准会造成中日、日韩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进一步固定、乃至扩大。第二，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招致国际社会的批判，使得原本不知道日本战争历史的年轻一代有机会开始学习日本的负面历史。从国际上来看，美国有一位研究人士指出，对于安倍首相的言行，全世界的聚焦点并不是“日本向世界夸耀的和平、民主主义国家形象的成绩”，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犯下的罪行”。^[1]

目前安倍政权的支持率超过50%是因为安倍政权出台了摆脱困扰日本二十年之久的通货紧缩的处方。我认为实际上大半日本国民并不支持安倍首相的理念。对于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在日本全国6个地区出现过7宗违宪诉讼，对此的判决也均是违宪或回避宪法判断中的一种，从未判决过合宪。和平遗族会、基督教遗族会、创价学会、全日本佛教会等都反对靖国史观。NHK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赞同的为44%，不赞同的为52%，今后应继续参拜的为27%，今后不应继续参拜的为38%。对靖国神社问题，及既有的安全保障问题，日本的论调一直都是分为两个方向，不能简单地将安倍政权和日本国民视为同一立场。若在中日间、日韩间针对对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互相反应，并愈演愈烈，那么就有可能使那些原本并不支持安倍路线的国民转变为支持安倍路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2012年9月份反日游行的时候不同，中国政府对安倍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表现克制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解决中日互不信任问题上，东亚可以向欧洲学习。欧洲共同体建设是在二战回忆还历历在目的时候，由德法两大国的政治领导者主导进行的。而现在的东亚，二战结束已经69年，战争的记忆渐渐模糊，区域内的两大国中日互不信任。缺乏信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难题，但在当今这个环境下将其作为无所作为的借口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二战后的欧洲也是到处弥漫着愤怒和仇恨的情绪。通过各国历代的政治领导者以及实务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终于建立起了信赖关系。在当今的东亚地区，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活动和民间交流，积累了相互信赖的基础。从此意义上来看，东亚比当时的欧洲具有更有利的条件。所以关键在于政治领导者是否持有建立相互信赖关系的强烈愿望。另外，中日韩三国还应该看到，东盟10国也是跨越了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等差异，通过建立安全保障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

[1] Jennifer Lind, "Japan Must Face the Past",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6, 2013.

来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在这一过程，东盟包容了遭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军事政权国家缅甸，并最终促使其向民主体制转换。东盟正按照2007年共同描绘的蓝图，计划在2015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亚太地区的权力失衡，这是造成中日关系、美中关系紧张的背后原因。由于成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力存在差距，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日本，并正在追赶美国。日美的对华基本战略是警戒与合作，但如果警戒过多，就会陷入相互扩充军备的“安全保障之囚徒困境”。奥巴马政权表示在继续关注中国军备扩张的同时，希望与中国一起发挥“新型大国关系模式”的作用。^[1]在钓鱼岛问题上，出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的防卫义务，美国有可能被卷入中日军事冲突，因此美国劝说中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纠纷。但是对此安倍首相坚持不存在需要协商的领土问题，因此现在仍有可能发生意外冲突。美国希望在亚洲建设一个安全保障环境^[2]，因此，虽然美国一直反对成立东亚共同体，但是如果能够修复破裂的中日关系和改善东亚安全保障环境，美国未必会反对再次推动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进程。

在二战后的欧洲，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但对周边各国来说也具有防御德国的安全保障意义。联邦德国加入NATO是在1955年。1989年，当柏林墙倒塌、东西两德重归统一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呼吁英法应该联手面对德国新的威胁。1992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达成协议之后，欧洲共同体（EC）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盟（EU）和创建统一货币欧元。当时，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德国国民说道：“德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通过不可解消的方式与欧洲共同体结合在一起，以获得邻人们的理解和好感。我想邻人们会对7800万的德国人感到放心的。”虽然不能期待东亚各国结成像欧盟那样紧密的联盟，但是我想，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也许能够缓和中日相互扩充军备的紧张氛围，至少不会使之激化。

东亚一体化的挑战不是从零开始的挑战，这是东亚有利的一面。实际上，东亚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一体化，通过金融等领域的合作，10+3在功能性路径上已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November 20, 2013. 参考网址：<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

[2] 同注[1]。

经有了一定的成果。虽然在制度方面，各国似乎对建立东亚共同体已失去了热情，但是就在2013年10月10日，10+3的领导人在文莱会议上重申：“将东盟10+3机制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的主要载体。”2004年的“日本政府关于东亚共同体的看法”一文中写道：“有必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考虑建立一种制度”，也许就是希望功能性路径的成果带来制度化时机的成熟。功能性路径的进展总体上是顺利的，但未能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对于10+3来说，处于危机下的现在正是激活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性路径来克服功能性路径局限性的时机。

我接触到的中国和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赞同我的观点。不过，从目前两国国内政治状况，从美中两国作为对立轴的国际政治状况以及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来看，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这一做法不是很现实。但是目前就连危机管控这一可行做法都未能实现，发生意外冲突的危险仍然存在。我认为，如果两国缺乏恢复中日关系的共识，眼下的危机管控是困难的；而缺乏建设东亚和平机制责任的共识，恢复中日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外交上，离不开权力政治的观点，但是也应该从大局出发，把理想蓝图作为行动指针。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很多学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也需要一些学者来描绘可供选择的理想蓝图。欧洲的政治领导者们之所以能够做出决断实现欧洲整合，是因为有许多的思想家和学者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欧洲整合的思想和蓝图。■

